



观察

两千年前辽西就有铁器“生产线”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



西汉冶铁业复原图。

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半地穴官署是简陋还是智慧

初见安杖子城址，很难把它与“重镇”二字联系起来。这里没有中原汉阙的巍峨，也没有关宫殿的恢宏。但凌源市博物馆馆长王森淼带着记者穿行在探方之间，一层层揭开了这片土地之下的传奇。

1979年开展的分区域重点发掘，让安杖子城址第一次向世人露出真容。发掘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发掘总面积约900平方米，分别清理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时代和西汉时期的房址12座，其中战国末期至西汉初的官署房址尤为引人注目。五间格局，坐北朝南，中设门洞，前带门楼——规制不可谓不高。然而，整座建筑竟然没有使用一块砖，屋顶全凭板瓦、筒瓦铺就。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半埋”形态：墙体大半藏陷于地下，露出地面的部分以夯土筑成。

“这不是工艺落后。”王森淼蹲下身，用手比画着当年的居住面高度说，“半穴式建筑既具有防寒保暖的功能，又兼具冬暖夏凉的特点，更能适应北方寒冷多风的环境，而且夯土就地取材、施工便捷，非常适合边城驻军与官署的实用需求。”

东区的一座西汉大型半地穴式建筑，更令人称叹。这座方形房址南北长11.9米、东西宽11.3米，深达1.4米，面积达134.47平方米。屋内密布47块柱石，其中6块高出地面，29块深埋地下，12块与墙体地面齐平。施工时先埋立柱、再夯实10厘米厚的居住面——这种暗埋柱础的工艺，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北方地区的主流做法，与宁城黑城城址、西安西郊汉代遗址的建筑手法高度一致。根据柱石的跨距与排列密度，考古专家推测，这曾是一座两层结构的高大建筑，或用于祭祀，或作为公共集会之所。

“同样的营造技术，到了辽西就因地制宜

地‘矮’了下去、‘埋’了进去。”王森淼说，“这不是退化，而是生存哲学。”

一枚齿轮的分量

如果说半地穴建筑呈现的是边城的生存智慧，那么遗址西北区出土的冶铸遗存，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汉代东北地区冶铸技术水平的刻板印象。

城址发现一枚汉代铁齿轮。据史料记载，这种16齿斜齿棘轮属常见规格，主要用于制动而非传动，形制大小与郑州博物馆、河北武安午汲遗址及下潘汪遗址出土的基本相一致。

众多考古资料可以说明，在汉代时期，齿轮就已经分为很多种类了，轮齿有直齿、斜齿、人字齿，说明齿轮制造已经多样化，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很多领域。西汉自武帝开始盐铁官营，全国重要产铁地区都设有铁官，所冶铸器物都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

一枚齿轮的分量，远不止是一件工具。它的存在意味着先进技术的体现，足以说明当时北方的生产技术与中原发展水平大体一致。这并非偶然现象，应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反映。王森淼认为，铁齿轮的出土，可以证明当时辽西边地已具备成熟的机械制造技术，代表着东北地区较高的手工业水准。西汉王朝对辽西的经营绝非流于表面的驻军控扼，而是将中原最先进的冶铸技术与生产工艺全面普及到了燕山以北。东北与中原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代差。

更翔实的证据来自城址东区和中区：铸铁铍钎范、坩埚、漏鼓风管、炉壁残块和炉算残块等冶铸构件和设备的密集发现，根据大小不同形制的炉算推断，当时应该有两种炼炉，证明西汉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各种铁制工具，如锄、铍、锯、斧和先进兵

器戟、剑、铍以及甲片等形制均与中原同类器物相仿。出土的大量铁铍钎范，说明辽城址内还没有常年制造兵器的作坊。安杖子不仅能自给自足地供应军民生产生活所需，更能批量铸造装备、保障边防驻军所需，无疑是西汉右北平郡至关重要的手工业与军备生产基地。

从生产工具的精细化，到冶铸产业的专业化，再到机械构件的先进化，安杖子遗址的铁器遗存层层印证着同一个结论：战国至西汉时期，辽西边地远非单一的军事戍守据点，而是一座兼具农耕、手工业与军备制造的综合性重镇。完备的生产体系与成熟的技术水平，为西汉长期经略辽西、抵御边患、连通塞外提供了坚实而持久的物质支撑。

远不止是“哨所”

采访中，王森淼也多次提出一个思考：安

杖子可能不止是戍守哨所。根据发掘报告分析，它拥有农耕屯田的腹地，专业冶铸的工坊、制式兵器的生产线，以及高级别的行政官署——应为一个集生产、保障、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边镇。

半地穴的官署保障了行政运转，冶铸工坊支撑了装备供给，大凌河沿岸的冲积平原则提供了屯田之基。三套系统互为犄角，构成了西汉经略辽西的“铁三角”。

“如果没有这套完备的生产体系，朝廷怎么能在辽西长期立足？怎么抵御边患、沟通塞外？”王森淼发出深深的疑问和思考。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再度站上台地。夕阳为九头山勾勒出柔和的轮廓，大凌河在不远处无声流淌。2000年前，这座边城里，铁锤敲击砧台的叮当声、官署间传递文书的脚步声、田垄上锄头破土的沙沙声，曾交织成辽西走廊上一曲真实而有力的生存交响。



凌源市博物馆馆长王森淼站在安杖子遗址标识前给记者指明古城方位。

二十枚封泥破译“行政密码”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

方寸之间的政务网络

“封泥兴盛于秦汉时期，加盖官印用以封缄官方行政活动间的信验物，相当于现在的‘密封条’，除却防伪保密功能外，这些封泥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更是研究古代官制、地理和文字的实物证据。”凌源市博物馆馆长王森淼说。

1979年，考古队在安杖子城址一次性出土19方封泥，后又发现“石城丞邑”封泥一方。这批封泥字迹清晰、形制规整，均为隶书阳文，涵盖多郡县官署印记。除“泉州丞印”“当城丞印”分属渔阳郡、代郡外，其余均为西汉右北平郡下辖核心县城官印，如“广成之丞”“白狼之丞”“廷陵丞印”“夕阳丞印”等。

其中18方封泥集中出土于同一灰坑，分布集中、年代统一，绝非偶然。考古人员据此判断，该灰坑周边正是城内核心官署区，是当年公文汇总、处理、留存的“行政枢纽”。地处边塞的安杖子，能够汇集右北平郡下辖多县公文，同时接邻郡政务文书，足见这里是辽西地区的政务中转与信息互通核心。

一枚封泥，一方官印，串联起郡县脉



安杖子城址出土的封泥。

如果说半地穴式建筑和城址布局、功能以及先进铁器还原了安杖子汉时的边城风貌，那么城址中出土的20方汉代封泥，则直接掀开了辽西行政运作的神秘面纱。这批堪称“文字档案”的封泥，是解读西汉辽西行政建制、疆域格局与政务运转的核心物证，史料价值远超一般文物。

络。方寸之间，西汉王朝在辽西的治理网络被勾勒得清清楚楚。

为古城定名投下关键一票

全部封泥中，一方“石城丞邑”价值最高，也最具争议性。长期以来，学界对安杖子城址的身份

争论不休。早年因缺少佐证，曾认定此处为右北平郡治平刚，后续黑城城址王莽钱范出土后，又有学者提出此处为西汉字县，但始终缺乏实证。“石城丞邑”的发现，搭配遗址地表采集的“石城”“大富千万”陶文，判断其为右北平郡石城县还是有一定可证性的。尽管学界对其是郡治还是普通县治仍有分歧，但这批封泥首次将城址身份从

他们的研究应该被看见

本报记者 王晓领

安杖子城址静卧在朝阳凌源市安杖子村的田地之下。这座横跨战国至西汉、存续400余年的古城，曾扼守辽西廊道咽喉，如今地面难寻城垣遗迹，整片遗址被农田覆盖，当地村民世代耕作于此，大多不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有过秦汉时期的城池。

没有顶尖学术团队的加持，没有大规模科研资源的支撑，朝阳凌源市的历史文化研究者们，凭着对本土文化的一腔热忱，常年扎根于此。他们踏遍荒田古坡，梳理残碑旧物，推敲史料碎片，默默深耕，试图唤醒这座被世人低估的边塞古城。凌源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龙兴、凌源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朱德华，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

踏遍乡野溯源

凌源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龙兴，退休后又依旧心系本土历史文化，常年往返于遗址与展馆之间。他反复研读1979年的考古发掘报告，细细考究每一件出土文物的年代与功用——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到战国、秦汉器物，从坩埚、鼓风管等冶铁器物到戟、矛、甲片等军备文物，再到20方见证层级规制的封泥，他在零散的考古资料中一点一滴地梳理着古城脉络。

张龙兴尤其珍视民间发现。改革开放初期，安杖子村一位村民刨炕时，意外挖出一块质地坚硬、久砸不碎的土块，正是此前未被发现的第二十块封泥。这种以黏土、鸡蛋清调和制成的封泥，历经千年不腐，是汉代官署文书往来的直接佐证。他将这些散落的民间发现与官方发掘报告相互印证，一点点拼凑出古城当年的图景，也让遗址的厚重底蕴跳出抽象的考古文本，变得鲜活可感。

跳出定名之争

长期以来，学界对安杖子城址的争议始终聚焦于定名——平冈(刚)县、右北平郡、石城县，众说纷纭。安杖子城址的身份界定愈发扑朔迷离。史料有限、证据不足、观点分歧，成为困扰研究者多年的难题。

朱德华选择跳出“纠结定名”的固有框架，将目光转向遗址的历史功能、战略价值与时代作用。在他看来，不纠结名号，才是解锁其历史意义的关键。

结合地理格局、边塞战事与交通脉络，朱德华推断，安杖子古城的核心价值在于军事战略意义。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为抵御匈奴入侵，将防线从河北腹地推至辽西凌源一带。安杖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紧邻大凌河、青龙河两大水系，背靠燕山余脉的河谷通道，是连接中原、辽西与内蒙古草原的枢纽要道，天然具备易守难攻的优势。

针对遗址大小双城的特殊格局，学界曾推测小城为祭祀场所。朱德华结合汉代边塞实情提出不同看法——彼时佛教、道教尚未深入辽西边关，并无祭祀建制的基础。小城更可能是军事仓储基地，用于囤积粮草、存放军备，大城则为政务与驻防核心。这一推论贴合汉代边防体系，逻辑自治，为古城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深耕者的心愿

没有宏大的学术头衔，没有充足的经费，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注，张龙兴、朱德华这批本土研究者，凭借纯粹的乡土情怀，坚守着小众的地方文史研究。他们的每一个推论、每一次考证，都源于无数次的实地踏勘、一遍遍的史料比对、一次次的民间走访。

通过张龙兴的梳理，安杖子的过往逐渐清晰：这里是张骞、李广从右北平出征抗击匈奴的出发地，是曹操北征乌桓的必经之地，更是“老马识途”典故的发生地；这里拥有辽西罕见的秦汉冶铁产业，出土的重型铁器、成套军备，印证了其边塞军工重镇的地位；存续400余年的城池格局、频繁的官署文书往来，彰显了它在辽西廊道中无可替代的枢纽价值，也填补了凌源辽金之前地方历史研究的断层。

让研究者们遗憾的是，如今安杖子城址保护力度薄弱，仅立有一块标识牌，大量历史细节仍深埋地下。他们多年奔走呼吁，撰写文章、梳理史料，只为外界对这片土地有更多了解。2023年，陕西西咸固张骞文化采风组到凌源考察，张龙兴积极参与交流，以期史料佐证张骞与辽西的渊源，让更多人知晓这位探险家出使西域之外的边塞征战往事。

不求名利，不逐热议——这些平凡的本土研究者，用他们的坚守照亮了千年遗存，只为让辽西边塞那段波澜壮阔的秦汉历史，被更多人知晓、铭记与传承。